

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

——新中国15位劳动模范口述

姚力 等◇著



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

——新中国15位劳动模范口述

姚力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 伟

版式设计：王 婷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新中国 15 位劳动模范口述 / 姚力 等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7770-0

I. ①生… II. ①姚… III. ①劳动模范—先进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7116 号

生命叙事与时代印记

SHENGMING XUSHI YU SHIDAI YINJI

——新中国 15 位劳动模范口述

姚 力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36 千字

ISBN 978-7-01-017770-0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目 录

序幕：劳模口述与国家记忆 /001

- 一、留住鲜活易逝的生命故事002
- 二、在个体生命叙事中感知国家大历史005
- 三、呼唤“山野妙龄女郎”009

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劳模表彰与时代印记 /013

- 一、中央苏区的劳动竞赛与边区政府的劳动英雄014
- 二、新中国十五次劳模表彰大会的频率与规模017
- 三、劳模表彰活动的四次高潮及其社会效应020

人物：对白与独白 /025

- 一、郑忠文：“我就爱为人民服务”026
- 二、沈延刚：玻璃炉窑设备专家、厂际攻关能手046
- 三、郑明久：人送外号“小转轴”的实干家063
- 四、李成坤：“党的恩情永远报不完”074
- 五、杨玉兰：郝建秀式的纺织女工088
- 六、关敬安：甘做厂子的“老黄牛”106
- 七、石尚文：“我一上机床就像上了战场”123

八、张玉仁：“我要沿着共产党这条红线走到底”	137
九、刘亮卿：“保卫工厂，工厂就是家”	160
十、杨玉环：从童养媳到劳动模范	165
十一、王淑清：不让须眉的“铁姑娘”	181
十二、肖淑菊：温暖城市街区的环卫工	201
十三、李希东：劳模师傅带出的“革新迷”	220
十四、李培金：埋头压铸工岗位不动摇	230
十五、刘贵良：从青年点长到“电焊大王”	235

余音：与爱党的情怀同行 /253

序幕：劳模口述与国家记忆

2008年《老照片》第57辑刊登了我采访、整理的一篇口述史，题为《从童养媳到劳模》。故事的讲述者杨玉环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但她起伏曲折的人生经历，连同她超强的记忆力和语言表现力，使我在第一次听她讲述时就被深深吸引。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生命故事竟然轻松解答了我在当代史研究中一个久未释怀的问题。于我而言，这篇口述访谈的收获实在不小，不仅深化了对“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①的探讨，而且真切认知到劳动模范口述的可贵价值与独特魅力。

正是有了这次尝试和思想感情的铺垫，2012年，当我得知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新村的“劳模楼”里还住着七十多位曾经荣获辽宁省、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老劳模时，国史研究者的使命意识，连同一种发现宝藏的欣喜、抢救记忆的冲动，顿袭心头。这一年的暑期公休假，我毅然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投入了在我看来更急切、意义更重大的任务之中，每天穿行于肇工街七马路与重工街十一路——这片我曾经熟悉的街区。自1998年离沈赴京求学，我还是第一次回乡待了这么久。在炎炎夏日，让我忘记疲劳、思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的，正是本书中15位老劳模细腻、传情的生命叙说。

^① 参见拙作：《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期；《中国视域的口述史学》，《人民日报》2010年5月4日；《试论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一、留住鲜活易逝的生命故事

史学研究者以真实再现历史为目标，为此，他们在历史文献和文物中仔细爬梳、小心求证，王国维先生由此提出“二重证据法”。当代史（国史）研究在史料方面有着其他历史研究无法比拟的优势，不仅文献资料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口述历史“活”资料。它们相互补充，为揭示历史真相提供了更多有力的证据。程中原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当代史研究经验时提出“四重证据法”^①，口述史料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鲜活”是口述历史的第一个特点。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口头讲述，与历史亲历者的个体生命紧密相连，而且缘于它生动、有趣，是以往文字记录中比较少见的新内容，更多地呈现了文字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现场状态甚至参与者的感受与评价，从而为历史叙述增添了血肉，可读性和真实感更加强烈。同时，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口述历史真正实现了载体多元、立体再现，以至于改变了历史阅读的方式，使历史不仅可以见诸文字，而且还能听闻声音，观看影像，适应和满足了人们新的阅读习惯以及获取海量信息的心理期待。口述历史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源流失太快、不可再生。它会随着记忆的丧失、生命的结束而被无情带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它的稀缺和珍贵。因此，搜集和整理口述历史的任务非常急切，“抢救”一词始终与之相伴。从一般人的记忆质量和寿命长度来说，70年的跨度是口述历史的极限。国史已经走过了近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参与者已纷纷谢世或进入耄耋之年，因此，这些活资料已处于濒危状态。

在受访的15位劳模中，当年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

^① 程中原：《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龄77岁，是口述史工作亟待抢救的对象。年龄最长的张玉仁，生于1929年，1952年3月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是最早的省劳模。最早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杨玉兰，生于1936年，1953年与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赵梦桃等一起被评为全国纺织战线劳动模范。被采访的对象中还有1956年、1959年、1978年、1979年、198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曾蝉联市、省或行业劳模称号，是地道的老劳模。访谈围绕着他们的人生经历展开，重点突出了他们在工作中如何成长为劳动模范，怎样受到表彰，思想动因如何，表彰前后工作和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国家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社会、企业的状态怎样，家庭、个人的命运如何；当人生步入夕阳晚景，回首那段闪光的日子又有哪些新的认识。这种个人口述史，非常具体、朴实、生活化，适宜这些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老工人，与他们始终处于基层生产一线的经历也比较贴切。透过他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人生的得意与失意，我们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状态，对于重构新中国大众生活史十分可贵。同时，他们又是普通大众中的精英，国家意志的坚定执行者，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平凡的生命故事折射出了社会风貌和国家大历史。

活灵活现、感动心灵，岌岌可危、稍纵即逝，这些特点足以使口述历史拥有大批的追随者。时下口述历史的持续升温 and 热络状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专业历史学者和民间历史爱好者齐聚口述历史门下，他们多以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甚至个人家族历史为对象，使口述历史向着公众口述史学方向发展，表现出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的公共史学特点。口述史学的这一潮流，不只是受欧美“大众史学”之风的影响，而且与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平等、共享等社会新理念的倡导直接相关，与经济生活改善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追求，乃至与传统文化复兴中历史兴趣一再被激活都不无关联。应该说，是时代多种机缘的会聚，铸就了口述历史的兴盛。反过来，它也为史学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现实生活需求作出了贡献。一部部普通民众口述史的叠加，为重建人们曾经活过的时日，理解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把握国史的主流与本质提供了可能。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 指出,“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①。因此,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同样是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

^① 转引自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史学理论》1995年第2期。

二、在个体生命叙事中感知国家大历史

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看似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表达的却不只是个人生命的苦乐辛酸，而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命运。在对劳模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老人家的个人经历都紧扣着时代的主旋律，记忆最深的往往都是重大历史事件或时代转折中个人命运的变化。个人史深深镶嵌在社会史当中，无法剥离。他们的个人生命叙事中，熔铸了太多时代的主题和国家历史的主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土改翻身，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从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红火到改革开放后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再就业，很多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都隐藏在他们个人的生命故事中，隐藏在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体验里。当人们被细腻丰满、生动感人的生命叙事所打动时，国史发展变化的主脉，也便清晰再现。当然，尽管“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①，但选择劳动模范这一群体，试图通过采录他们的口述历史来管窥国史，是充分考虑到新中国劳动模范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禀赋的。

通常意义上，“劳动模范”是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统称。作为一种荣誉称号，曾有过“劳动英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等多种名称的变化，然而，他们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内涵却始终没有改变。劳模表彰开启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模表彰活动一直在持续，贯穿国史的全过程。从1950年第一次全国劳模表彰至今，共进行了15次，有3.1万多人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称号。而各行业、各地区的劳动模范数量，则难以统计。因此，对劳

^① 王志清：《历史如何记忆，如何记忆历史——关于苏联红军暴行的民间记忆》，王兆成主编，王学典执行主编：《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2辑2014年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动模范、劳模表彰的研究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而劳模口述则是国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源。

其一，劳动模范是中国亿万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们理应国史留名。用口述史的形式记录劳模历史，不仅不是“小题大做”或“个人标榜”，相反，恰恰是一种回归和补偿。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源自人民群众的辛勤汗水，而劳动模范更是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超乎常人的牺牲和奉献。曾经有台湾学者对新中国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由衷感慨，“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的成就？”^①这些可亲可敬的劳动模范，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座丰碑，构筑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个个标识。我们的人民要世代永远记住他们，这是形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建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弘扬正气是劳模口述的天然属性，而它之所以具有感染人和教育人的能力，主要是由于：真实，没有任何艺术加工或虚构成分；质朴，生成于生产劳动的实际；亲和，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间；鲜活，蕴藏在每一位劳动模范的生命中；圣洁，展现了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境界。在采访和编辑过程中，15位劳动模范的成长故事，处处折射出平凡外表下高贵的灵魂。尽管他们的获奖年限前后跨越了40年，但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鲜明特点：不仅是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具有高超的生产技术水平，而且爱党、爱国、爱事业，始终占据着思想道德的高地。正因为此，劳模口述史的价值也便不彰自显。

其二，在劳动模范身上会聚着国家上层意志和民间社会互动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劳动模范是国家建设事业的“骨干”和“支柱”，也是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②他们兼具普通百姓和社会精英两种特质。“普通”指他们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一直是劳模评选的基本原则。他们来自人民大众，而且绝大多数在走

^① 有林：《略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思考》，载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当代中国研究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

^② 《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

下奖台后，始终工作和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即便少数劳动模范后来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但大多没有脱离生产实际。“精英”指他们是开风气之先的时代精神楷模，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都在一般人之上，是国家意志的坚定追随者和忠实执行者。品德高尚，对党、对国家、对事业无限忠诚，任劳任怨、勇于创新，一直是劳模推荐的首选条件。“看似寻常最奇崛”，劳动模范德行与技艺兼备，实干与机智同生。“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格。他们不愧为我们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和人民的楷模。”^①他们始终是时代的领跑者。劳动模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个人命运既承载着时代的主旋律，又包容和体现着下层百姓的基本形态。他们是在时代的大潮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成长和成绩书写着时代主题。

其三，劳模口述是开掘民族性创生的力量源泉。尽管时代主题在变化，但劳模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却是跨越了时代的共通性道德，有着历久弥新的恒久性价值。如何让劳模精神成为构建社会风气的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企求个人发展、国家昌盛的国民心态，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嬗变中的国民心态也使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困境。崇拜金钱的物欲化倾向、缺乏理性的群体躁动倾向、人性衰退的冷漠化倾向、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无责任化倾向，在社会上滋生蔓延。^②在这种背景下，追念过往也便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惯性。劳模精神所张扬的时代风尚，是当代中国不灭的印记。而今，重新翻阅当年的劳模事迹，那个火热年代里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道德形态和生活形态就会自然呈现。如何把个体记忆打造成集体记忆？口述历史是一条主渠道，而且它因真实感人的特点，更易于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在产生心理共鸣的同时形成共通的价值理念。回首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群英会，到当下振奋民心的“感动中国”和“中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深入学习劳模精神、大力弘扬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品格的决议》，《工人日报》2010年7月28日。

^② 邵道生：《现代化的精神陷阱》，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90—135页。

国骄傲”，各时代劳模身上所会聚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都与全国劳动模范举行座谈，大力倡导发扬劳模精神。在2015年劳模表彰大会上，他指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①实践证明，劳模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生存、前进之魂，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撑。

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人中，能够被后人记得的也寥寥无几；即便是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如“高炉卫士”孟泰、“铁人”王进喜、“宁肯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时传祥、“两弹元勋”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蒋筑英等，能够被人们所了解的也只是宣传材料中极为有限的字句，留下的影像和亲身讲述的故事难以寻见。他们精彩动人的人生故事随风而逝，这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缺憾或许是小的，但对于国史来说缺憾却是巨大的。因为，留住他们个人的记忆，实际留住的是一辈人艰苦创业、勤劳奉献的集体记忆；留住他们个人的生命史，实际留住的是新中国的社会变迁史和国家建设史。缺失了这些，国史何以称为人民的历史，何以为民族的复兴开掘内生的动力、注入不竭的能量？

^①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三、呼唤“山野妙龄女郎”

1956年5月24日，范文澜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热情洋溢地推荐刘尧汉先生依据云南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写成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将它形象地比喻为“山野妙龄女郎”。范文澜先生认为，此文妙就妙在“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①。历史研究要走出沉疴老套，特别需要这些富有新意的田野来风。口述历史对于正在建设中的国史学科来说，正如充满活力、纯洁、质朴的“山野妙龄女郎”，不仅带来了新史料，最重要的是，引入了新方法、打开了新领域、发现了新问题，是国史学科创新的增长点。

国史研究最初是从党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因而比较偏重于政治、经济、外交等上层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对于民间社会历史关注较少。就目前出版的国史书籍来看，很多领域还没有深入开发，无法体现国史特色，呈现国史全貌。口述历史强调走出书斋、迈向田野、“眼光向下”。这些理念直指国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应和了国史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国史研究者在采摘口述史料这些“鲜果”时，一定会引发许多新思考。即便是一些老问题也会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萌发新认识。我在学术实践中深有体会，过去曾经研究过的问题，因为可触可感的口述历史而变得丰满、立体起来，开阔了历史想象的空间。在访谈亲历者后，当再度阅读国史书籍和资料时，头脑中不只是抽象的结论或数字，而是闪动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由此，历史研究中一些深层次命题，也会走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国史研究中成果十分缺乏的心态史研究，便是一个。

国民心态是国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孕育生成，

^①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

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它潜藏于大众情感之下，不易于被观察，却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因为人的情感、信念、意识等内心深处的体验，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心态史学自诞生以来，其研究史料的不足就一直制约着它的发展。个人口述史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因为在生命历程的叙述中，内心的动机、情感的波动、各种心态的交织，都会比较直接的真情道白中呈现。同时，由于这些感受源自个人的经历，其可信度也比较高。与文字记载相对的口述资料，承载了集体的认知、理解和分析。因而，对口述历史的研究，还可以透过回忆和讲述，探求人们深层的情感和观念的转换，理解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判。正如约翰·托什（J.Tosh）所说，“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述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①。在多个个人心态描述中，我们可以抽离出富有共性的民众心态。

就这15位普通劳动模范的生命史来看，心态变化反映最为充分的有两段，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是职工下岗、企业倒闭潮中。之所以讲得多、记得深、反映强，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段他们生活变化最剧烈，人生情感起伏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描述最多的是“报恩”，是翻身后对党和国家的无限感激之情。这些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劳模，多是穷苦人家出身，对旧社会的苦难有切肤之痛，新中国的成立才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从遭受凌辱到扬眉吐气，从穷困潦倒到成为最光荣的工人阶级，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剧变，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今天回首过去，报答“党恩”，仍然是他们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语。这种源于个人体验，叠加了社会教育的心态感受，已经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记忆中。郑明久说：“1949年解放，我16岁了，家里分了田、房子、牲畜，吃饭有指望了，生活有了保障，这才让我去上学。我个子挺大，上一年级不好意思，直接上了三年级。”李成坤说：“我从农村出来就一个报恩的思想，没有共产党能分地、分房吗？政府能给我开介绍信来沈阳找工作吗？所以说始终不能忘记党的恩

^① [英] 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情。”石尚文说：“回想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一心就是干，几乎家事不管，每个礼拜六上技协，晚上得给人讲课，完了活动，礼拜天还出去。那时一心想着就是对党的恩情，就是始终不忘本。”杨玉环说：“我啥思想你们知道吗？就是报恩思想，别的不明白，当家作主了，党说啥咱就干啥，好好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朴素的报恩思想，深沉的赤子情怀是那一辈劳动模范的思想底色，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百姓的普遍心态。

20世纪末，沈阳这座新中国老工业基地，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大潮的冲击。曾经“新中国工业长子”的威风一落千丈，聚集着几十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铁西区有几十万工人下岗。这段记忆是痛苦的，也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也是劳模们心态展示比较充分的地方。本书采访的15位劳模中有11位来自国有大中型企业，绝大部分人自20世纪50年代进厂。他们与工厂一起成长，经历了加班加点的生产“大跃进”，生活艰苦的低标准，“抓革命、促生产”的“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国有企业的风光和从生产低迷到最终倒闭。他们从一名小学徒成长为技术能手、工厂的顶梁柱。三四十年不离不弃、荣辱与共的陪伴，使他们与工厂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工厂就是家！”他们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怀念和老工友一起奋战的时光。李成坤说：“我非常留恋那个老地方，原来厂房在哪儿，我都清楚。”他们本身就是工厂的活历史。如今退休在家，老厂子多半已经搬迁或出卖，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变化的不是厂房或厂区，而是他们精神家园的失落。王淑清说：“16岁就入厂，一辈子在那儿，最后看着这厂子没有了。这心情确实不好受，没法形容。”关敬安说：“咱厂子现在啥都没了，都扒了盖楼房了，那心里滋味能好吗？就不说我了，人人都对厂子有感情。”这一时期，以沈阳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心态是酸楚的，但同时也反映出工人对企业的情感，对国家命运的关心。这些深层的社会心态，通过个人生命史得以记录和诠释。因此，不得不说，口述史料和方法的引入，将大大开拓国史研究的实践，带来国史研究的新气象。

本书记录的15位劳动模范，每位都只是新中国数以万计的劳动模范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他们的口述史，也仅仅是新中国劳动模范口述史的冰山一